

家族企业的 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

一个分析框架及其
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
问题的解释

JIAZU QIYE DE CHENGZHANG
JILI YU BIANQIAN LUJING

余立智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

——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问题的解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余立智 著
藏书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问题的解释/余立智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ISBN 7-5005-7715-X

I. 家… II. 余… III. 家族企业：私营企业—研究—中国
IV. 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8010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9.75 印张 230 000 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20.00 元

ISBN 7-5005-7715-X/F·676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浙江财经学院学术专著
出版资金资助

(2004 年度)



企业家族制是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重大制度现象。就制度结构及其性质而言，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制，是指“由相互具有亲族关系的家族成员拥有企业控制权，并根据家族内部相继的制度规则，实施和维护控制权的企业”。这种企业的经济性质及其治理结构与欧美古典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家族企业相同，但完全不同于现时例如世界 500 强企业中的一些所谓“家族企业”。这些企业的家族制度性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创业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股权及其所对应的财产权已经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而中国民营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产权却是模糊的；在西方现代大企业中，家族成员与企业的合约是明晰公开的，而中国企业中家族成员与企业的合约关系却是隐性的和不规范的。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大企业的制度结构及其行为是标准的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利润最大化，企业治理以正式制度为架构，而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制度结构则具有较强的非正式制度特征，追求的是家族财富最大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古典企业制度性质相近。因此，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制问题的研究有必要澄清当前媒体舆论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误导，在理论和经验上实证分析中国家族企业制度的现实变迁路径。

《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一书是余立智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而成的专著，该书从“企业”和“家庭”的特定契约特征出发，把家族企业的经济性质归结为由创业家族与非创业家族要素间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和创业家族

内部成员之间的“永久关系性合约”所共同组成的复合契约结构，从而把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拓展到超越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的社会关系范畴，构建了一个基于契约理论的家族企业分析框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该书较好地将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运用于对家族企业的经济性质的考察，对家族企业复合契约结构的缔结、执行、维护和变更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刻画，据此得出了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结论。另外，该书以家族制企业的控制权和控制权市场为基本分析线索，提出了一个较好的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的理论逻辑。控制权作为企业产权，在职业企业家（经理人）所拥有的人才要素与创业物质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间构成的交易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相应的家族制企业的控制权市场。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低文化和低信任度的社会里，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是以非规范化和人格化为主的，这造成控制权市场交易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障碍。质量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是事前、事后的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盛行，市场上只有少数的卖主和买主，其数量比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少得多，就成为一种阿克洛夫意义上的“稀薄市场”和“柠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制度不过是对中国扭曲制度环境的非人格化交易制度的一种理性替代。在余立智博士的这部著作中，围绕家族制企业控制权市场不完全失灵所进行的理论实证可以说是其对学术界的一个最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至今国内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对家族企业制度结构和经济性质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鉴于这种情况，《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一书无疑是一部值得期待的著作。然而，客观而言，该书在经验实证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仍有必要跟进大量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检

验，使理论假说有可观察的事实为依据和支撑。希望作者能坚持对企业家族制现象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能引起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中国家族治理问题的高度关切和深入探讨。

金祥荣

2004年8月28日于浙江大学



前言

谈起家族企业，以下两组研究数据不可不提，一是据 Beckhard 和 Dyer 等学者的研究，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4 年，其中只有大约 30% 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还不足总量的 13%。另一是据 Shanker 和 Astrachan 等学者的研究，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由家族所有并经营的企业在世界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也有 65% 至 80% 之多，而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40% 以上都是家族经营企业（Family Organizational Business）。

抛开这两组研究数据所可能存在的统计误差不谈，真实世界里家族企业“高出生率”与“低存活率”相并存的情况大体上应该是不错的。这使得人们对这种企业组织形态的价值判断结果充满了歧异。一些把立论基础放在“低存活率”上的人士言之凿凿地将家族经营视为制约企业持续成长的桎梏，而把立论基础放在“高出生率”上的人士则大为历史上家族经营企业的公正待遇翻案平反的意思。

其实，企业之间的长程竞争本身就是一个赢者寡、输者众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企业家的抱负以及能够把这一抱负付诸实现的能力（包括运气）是一种稀缺资源，那么多数企业倒下去（成长不起来）、少数企业站起来（成长为巨型企业）就不应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与企业是由家族经营还是由非家族经营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何况，虽说所谓“富不及三代”，可是在全球范围内找出几个已历三世而不倒的家族百年老店也并不是什

么难事，比如打造出世界男装第一品牌杰尼亚（Zegna）的意大利杰尼亚家族集团（创立于1910年），再比如生产和销售百威（Budweiser）这一啤酒行业第一品牌的德国安海斯——布希家族集团（创立于1876年），而能够绵延百年历史而依然基业常青的非家族经营企业又能数出几个？由此可见，硬要把家族企业的“低存活率”与“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短命”这一规范性命题拉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家族经营要比非家族经营更有效率、更经济呢？这也不尽然。应该看到，虽说沃尔玛、福特、菲亚特、默多克新闻集团、长江实业这些响铛铛的巨型企业至今仍然主要是由其创业家族所有并控制的企业，然而这些能将事业做到国际水平的家族企业，其实都无一例外地已经在传统家族经营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在企业的产权状态、要素构成和治理机制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就趋势而言，我们根本无法排除有朝一日这些企业的创业家族不会步历史上其他著名家族企业的后尘，选择将企业交由“外人（职业经理人）”打理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究家族经营企业为什么“变”（所谓“变迁动因”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变”（所谓“变迁路径”的问题），可能要比在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之间作简单的优劣排序更为重要。这是笔者将家族企业的研究重心锁定于家族经营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这一主题的原因。

在当今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从来就不乏“家族经营企业”完全脱胎为“公众公司”的成功案例（如杜邦、通用、标准石油等）。正因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1966）曾将之定性为“经理资本主义”对“家族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如果从企业的合约性质去理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经理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家族资本主义”的失败。在我们

看来，西方世界的创业家族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满足于充当“消极股东”的角色，主要还并不是因为职业经理在专业能力方面所可能具有的强势地位，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像放飞风筝一样，凭借一套历经数百年历史才相对完善起来的复杂要素市场交易系统，把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半径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或者至少不会被经理人牵引得不知所终。

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问题可以进一步明晰为：民营企业的创业家族始终坚持将企业的核心控制权（包括企业的战略决策权、资产处置权、人事任免权以及财务支配权等等）掌控在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家人”手中。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由于目前中国在要素交易系统发育程度上的初级和低效，家族经营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可能不再是许多民营企业的“最优”选择，但却可能是他们在现有外生约束条件下最“不坏”的选择。只要民营企业现有产权状态及其执行环境不发生根本性转化，西方企业制度演化历史上的所谓“经理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大范围发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一定会“锁定”在家族制度所营造的“低水平陷阱”中逐渐衰落。作为竞争性市场上某种产品的专业提供者，民营家族企业要面对市场择优机制的考验，因此，在残酷市场竞争的“刚性”约束下，家族经营“不变”是相对的，而“变”则是绝对的。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传统家族治理的改造和扬弃活动，并且已经创新出了许多更富有组织弹性的高级家族治理形态。比如把“经理人”吸纳为“自家人”的“泛家族”治理模式，把“自家人”改造为“合格经理人”的“家族行为企业化”模式，把“家族企业”团结为“企业家族”的“家族企业集团”模式等等。虽然这些民间自发制度创新活动

的长期绩效还有待观察，但已经足以使我们对民营家族企业的成长前途抱有比“惟两权分离”论者更为乐观的预期。



摘要

家族制企业是人类工商业史上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家族企业群体演变并与之协同进化的历史。如果我们以创业家族对企业控制权的实质性占有作为识别家族企业的标准，那么家族企业就不仅是古老的，而且是现代的；不仅在家庭价值观浓厚的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是基础和普遍的，而且在崇尚个人理性、经济成熟度高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同样是基础和普遍的。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长期共存及企业的“家族化”现象与企业的“非家族化”现象长期共存的客观事实，我们不仅有必要解释家族企业何以生成，同时还有必要解释家族企业何以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把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论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加以逻辑一致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复兴”与“复归”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称之为“复兴”，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兴崛起的个体和营企业，其大多数都是由相互间具有亲族关系的家族成员所有并控制的家族企业。而这一企业制度特征又与我国自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家族制度（以族谱、族田和族长为标志）和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营家族企业传统一脉相承；之所以称之为“复归”，是因为伴随着“国退民进”和集体企业“二次改制”进程的不断深化，一大批由原公有制企业（含国有和集体所有）改制而来的新兴民营企业在要素构成、产权状态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家族化”

的组织倾向。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家族企业制度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因此，不对家族制企业的生成和变迁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将无以把握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演进方向和成长前途，这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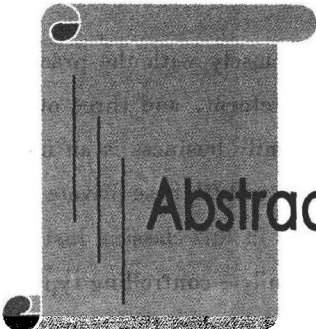
本文除第1章导论之外，其余篇幅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部分。理论部分由第2—5章构成，主要是提出一个分析家族企业生成机理和变迁路径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由第6—7章构成，主要是应用这个理论框架讨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现实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第8章是分析结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些规范性命题。

第2—3章主要是对“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家庭经济学”这两大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进行述评，并据此提出对“家族企业”经济性质的系统认识。我们首先考察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的“企业”和“家庭”，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现代企业理论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四条主要研究线索，再后是回顾了家庭经济学中与家庭内部生产组织相关的一些代表性理论观点，最后是从家族企业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以上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总评，并就此引申出我们对家族企业经济性质的系统认识。在本文中，“家族企业”被处理为一个由“家族资本”和“非家族资本”所共同组成的复合要素契约结构。作为这一企业契约结构的“核心签约人”，企业家（家长）将在企业组织的“家族化”与“非家族化”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第4—5章主要是对家族企业合约的缔结、执行、维护和变更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并据此得出关于家族企业生成及变迁的一些一般性结论。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企业家缔约过程，证明由于财务和人力资本市场上所固有的“柠檬效应”，

家族企业契约结构是企业家（家长）创业阶段最为经济与现实的选择；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要素逃逸”模型，用以说明家族企业合约的特殊执行和维护机制；再后，我们分析了企业家（家长）能力在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解释家族企业的变迁动因；最后，我们引入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用以探讨决定家族企业产权变迁路径的各种局限条件。

第6—7章主要是运用前两章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民营企业所处的具体宏观制度背景，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组织倾向的内在原因。我们首先对经济转型期中国新兴家族企业（简称NFB）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家族企业（简称MFB）进行比较，目的是区分西方家族企业与中国民营家族企业在组织行为方面的差异；然后重点论证了财产权利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明确了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分离的诸多实施条件；再后，我们结合中国民营企业的现实产权状态及其产权实施环境，解释了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并有可能“锁定”于家族企业制度的原因；最后，我们在给定中国民营企业不可能主动选择放弃家族控制权的前提下，结合民营家族企业的具体实践，分别考察了“家族行为企业化”、“泛家族主义”和“企业网络化”等数条家族企业扩展方式的理论含义。



Abstract

Family business is one of the oldest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rket economy, to a certain degree, is a history of family business evolution. The family business is not only ancient, but also modern if it is identified by the ownership. The family business plays a universal and basic role not only in the Pan - East Asia with a thick family value of Confucianism culture, but also in the mature rational market economies. In China, with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business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E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rejuvenates and develops fast. These are the reality basis of my research.

The paper develops with the “embedding” and “withdrawing” of family capital in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f firm.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fruits of modern firm theories and modern family economics, the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nature, growth mechanism and its path of change of typical family business. The core ques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e following: (1) what is the natural distinction between family business and non - family business. (2) How the family originates, how it promotes the form of the firm order and what decides the boundary of family business. (3) What is the reason of the change of family business and what decides and influences the trends and the path of changes, and what

is the result of these changes.

These pure theoretical problems hand closely with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sector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three other sub - questions will be extended: (1) If family business is an ineffective classical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why will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commonly choose to voluntarily lock in this classical institution structure? (2) If the transition from family - controlling type to manager - controlling type is inevitable, what hinders this transition from happening? (3) Is there another chang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amily business,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tive growth type -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execution, if the institutions are exogenously give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which includes four chapters (Chapter 2 to chapter 5),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developed for analyzing the structures, operations and evolutions of classical family - firm. The second part consisting of two chapter (chapter 6 to chapter 7), explores a more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past process and for the future path about family business in china. in the fifth chapter, we make a summary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and present a brief prospect about research on family business.

In Chapter Two and Three, a literary review will be given about the “modern firm theory” and “modern family economics ”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cognition of “family business”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ies. Firstly we examine the concepts of “firm” and “family” in the neo - classical analytic frame. Secondly four main research pat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irm theory are discussed

on the base of classical ideas. Some relevant representative ideas about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within family in family economics are reviewed. At last, a general evaluation about the ideas concerning those two research fields will be given, and the systematic cognition of the family business will be extended. “family business” is regarded as a composite contract structure with “family capital” and “non – family capital” in this paper. Entrepreneur (or patriarch) plays a role of “central contract signatory” and he makes a choice between “familization” and “non – familization”.

In Chapter Four and Five, the theoretical positive analysi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enforcement, maintaining, and change of the family business contract is conducted, based on which, some general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forming and change of family business are drawn. Firstly we examine the process of contract establishment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rove that family business contract structure is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realistic choice that the entrepreneur can make, because of the Lemon Market effect in the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markets. Secondly we develop a “factor escaping”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f special enforcement and maintaining of family business contract. Then we analyze the central function of entrepreneur capability in the growth of family business and explain the motive for the change of family business. At last, we introduce an agency – principal model to analyze the limited conditions deciding the property right change of family business.

In Chapter Six and Seven, we mainly apply the theory developed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to discuss the internal motive of the